

一些，这是有利的条件。满文《大藏经》受到朝廷的支持，有特别豪华的刻本，西藏布达拉宫七世达赖灵塔殿中供着一部满文《大藏经》，用朱字印制，封面用硬木刻成，金条镶边，玛瑙、珍珠点缀，是康熙和雍正时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故宫也发现两部满文《大藏经》。原先在承德有完整的一部，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后，有识之士担心日本占领热河后满文《大藏经》将无法保存，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教授主动请缨，到承德调查情况，想将它运回，但热河很快就沦陷了，那一部满文《大藏经》也被日本人运到东京据为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东京受到盟军飞机轰炸，这部经典被毁坏，大家哀叹满文《大藏经》从此绝迹了。不过，后来在布达拉宫见到了一部，又在故宫发现了两部。此外，还有部分的佛经翻译，如回鹘文的，新疆古代回鹘人当时建立起的一些小邦都是信仰佛教的，现在在新疆可以看到吐鲁番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等很多佛教遗址，说明在古代，佛教是经过新疆向内传播的，许多佛教大师也是新疆人。还有部分于阗文的佛经，这些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样品曾参加在北京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展览。还有傣文的佛经，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盛行南传佛教，有一些从泰国等地传入的小乘经典，如《清净道论》。学习佛教思想史的人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中佛教也是经过多民族引进的，长期以来许多民族分别接受了佛教，并翻译佛经，其中最成系统的是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虽都是佛教经典，但也有其不同之处。汉文《大藏经》中除了翻译的佛教经典外，还有一部分把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佛教作品、解释、辩论等都加了进来，叫做“此土撰述”；藏文《大藏经》不包括这些部分。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bkav - vgyur) 和《丹珠尔》(bstan - vgyur) 两部分，其中《甘珠尔》是指佛亲口所讲，并由弟子们回忆汇集而成，佛经中有“如是我闻”体的即属此类。其中bkav是敬语，在藏语中对佛、尊长等常用敬语，敬语的保存不一定是阶级差别，是尊敬和礼貌，这种情况在汉语中也有。“珠尔”(vgyur)就是翻译，就是变的意思，也就是变印度梵文为西藏文字。《甘珠尔》也称bkav - ro - cog，ro - cog是一切的意思，所以《甘珠尔》是一切经。《丹珠尔》的“丹”是阐述、演绎主义，《丹珠尔》也就是一切论，是佛弟子们或后人对佛所说教义的阐释。现代西方人简称藏文《大藏经》为“Tibetan Canon”。藏文《大藏经》的二分法和汉文《大藏经》的经、律、论的三分法有差别。可以用一个表来说明：

大藏经	汉文	经	律	论
	藏文	甘珠尔		丹珠尔

经、律、论，总称“三藏”，藏是收藏、保存之义，最初的意思是“筐子”，因古人读书时将三藏分置在不同的筐子中。一个法师如果经、律、论三藏皆通，就被称为“三藏法师”。玄奘法师就是这样的法师，藏语称他为“唐僧喇嘛”。如果精通三藏中的某一部分则或称经师、或称律师、或称论师，弘一法师即是律师。对唯识、中观等理论非常精通、非常雄辩的法师则被称为论师。对某一部经非常熟悉、精通的就叫经师。汉文《大藏经》为什么会有三类呢？因为它将“律”专门立为一部。西藏人则认为，律条既然是佛所说，就应列入《甘珠尔》，至于后人所加的一些律例等则应归入论部。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对于佛教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现代西方有许多人想学习了解佛教，汉文和藏文两种文字是必须学习的。西方现在学习佛教的人有许多是汉文藏文兼通的，因为这两种文字可以互相补充、加深理解。总的说来，显教部分是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中都有的，相互也是差不多的；但汉文《大藏经》中密教内容诸如仪轨、密咒等很少，而藏文《大藏经》则有大量的密教内容。这是因为佛教传入西藏时，正赶上密教兴起，佛教为了适应大众，不得不放弃高深的理论讨论，而向印度教靠拢，采取其中的密教部分。

藏文《大藏经》的结集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据传说，藏文是7世纪时，由吞弥·桑布扎创造的，他受藏王派遣，去印度学习，同去的有十六人，回来只有他一个人。回来后，他将梵字母结合藏语实际创造了藏文。藏文字母是用梵文字母形状和排列结合藏语语音实际而创造的。

吞弥桑布扎的“吞弥”是其姓氏，现在拉萨西边尼木县还有叫吞巴的地方，这大概就是他的家乡。“桑布扎”是印度人对他的称呼，其中“桑”是好的意思，“布扎”（bod）指西藏人。吞弥桑布扎意思是吞家的好藏人。吞弥桑布扎是西藏的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现在西藏社会科学院院内还有他的塑像。现在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认为，从语言的创造到应用应有个长期的过程，吞弥创造藏文后马上就能译佛经不太可能，藏文应是由藏族先人创造，然后由吞弥将它完善、规范的。但很多藏族人士不同意。据传吞弥有八部文法著作，现在留存的还有两部。据载他当时就翻译了几部经，其中包括《宝篋经》、《十善经》、《十万颂般若经》等。《十万颂般若经》是否当时所译现在还难以确定。般若经在藏区流传不是简单的事，般若即 prajna，是智慧的意思，波罗密多即 pramita，是到彼岸的意思。这种学问一传入藏区，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般若经有八千颂、二万五千颂和十万颂等。据《贤者喜宴》记载，吞弥翻译了《十万颂般若经》，但我们现在见到的译本是别人完成的。敦煌汉文卷子，伯希和收藏的4646号和斯坦因收藏的2672号内容相同，即《顿悟大乘正理诀》。这一文献极其重

要，其中记载了一个唐朝和尚到拉萨传法的情况。当时汉地佛教已经很成熟了，建立了很多宗派，藏地就邀请内地和尚到西藏传教，每年派两个，两年一换。这位和尚叫摩诃衍（mahayana），即大乘和尚的意思。当时西藏佛教界分成两个派别，即顿门和渐门。内地去的和尚主张顿悟，认为不需要坐禅，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思想，猛一下就可以觉悟，从而明心见性。主张渐悟者认为，必须次第而修才可以达到最终解脱。结果，两派之间进行辩论，这是从敦煌卷子中才知道的。双方用什么语言进行辩论？也许是笔谈。在什么地方辩论的呢？大概在桑耶寺。法国学者戴密微曾写过一本《桑耶寺的诤论》（汉译本叫《吐蕃僧诤记》）讲了这次辩论，其中引用了《顿悟大乘正理诀》。里面提到，吐蕃延请婆罗门僧三十人，唐僧摩诃衍等三人，互相进行辩论，可见，从藏文的创立，到解释佛经，再到进行佛教的辩论中间经历了一百余年。

吐蕃王室为了翻译佛经，建立了三个译场，其遗址都在桑耶寺附近，由此也可看出，辩论很有可能是在桑耶寺进行的。三个译场即庞塘、青浦、登噶。他们各自将已经翻译的佛经名称及著译者登记为一个册子，记录在案，作为一个目录，互相传看，避免重复，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登噶目录》。布顿仁波切当时还看到了其他两部，以后就很少有人见到了。《登噶目录》记录有二十七类佛经，计670部。

翻译家当时是很受尊敬的职业，他们留下了许多很重要的东西。其中最出色的有三位大译师，即噶（ska - ba dpal - brtsegs）、属（cog - ro - kluvi - rgyal - mtsan）、尚（zhahg ye - shes - sde），最后一位估计和皇室有姻亲关系。精通藏汉两种文字的佛学翻译大师管·法成和玄奘法师一样作出过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是陈寅恪教授在阅读敦煌佛教文献时发现了。管·法成是9世纪出生于后藏达那地方的，他曾翻译过二十几部经，其中包括著名的《贤愚经》，这部经没有梵文本，是汉地几位出家人在于阗听印度法师讲经的记录汇集而成，后来藏戏的许多内容即来源于此经。戏剧是用音乐、舞蹈等形式来表演文学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一个有戏剧的民族才是文化成熟的民族，藏族有戏剧，其戏剧多半是表现佛经故事的，所以佛教的传入，对西藏文化影响至深。另外，《贤愚经》中的故事也表现在壁画上。可以说在丰富藏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翻译家们立下了很大功劳。管·法成不但将梵文和汉文的经典译成藏文，同时还是一些藏文经典译成了汉文。其实，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多民族的智慧集合而成的。例如《解深密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当年玄奘法师讲这部经时，他座下有位叫圆测的新罗法师进行了记录，他记完了，就将记录稿交给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就将它作为圆测的著作，这就是著名的《解深密经疏》，后来失传了，汉地的人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书。这部经流传到敦煌后，管·法成把它译成藏文，在藏文《大藏经》中却保留了下来，其译

者就是管·法成。20世纪初杨仁山从日本大内图书馆找到了此书汉文本，非常高兴，但后来发现缺了二品，十分可惜。当年陈寅恪希望有人对照藏文将汉文本补足，20世纪80年代初，赵朴初先生请观空法师从藏文译汉将其补足了。一部唐朝的玄奘法师从印度请回的经，由新罗的法师在听讲时用汉文记录，再由藏族法师翻译成藏文，汉文本又被日本人请到日本，杨仁山从日本取回汉语残本，请人再由藏译汉，形成足本，其中因缘不可谓不殊胜。管·法成还翻译了《金光明经》等经，但他的身世一直不为人所知，日本龙谷大学的上山大峻比较注意此人，认为他是汉人，这是站不住脚的。在今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以北达那地方，即有管氏家族存在，此家族乃吐蕃时期的一个大家族，可以肯定管·法成系藏族。

随着翻译佛经的增多，藏译佛经结集成《大藏经》的时机成熟了。13世纪，噶当派的法师菊木登日惹（bcom - ldan - riz - ral，世尊智剑）和卫巴洛赛（dbus - pa - blo - gsal），他们两位合作在纳塘寺收集各地佛经的写本，编辑《甘珠尔》和《丹珠尔》，布顿仁波切编辑了一个《丹珠尔》目录，附在其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中。但更重要、更规范化的写本是由蔡巴万户长主持编成的《蔡巴甘珠尔》。这部《大藏经》1950年以后被请至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地下图书室专建恒温室保管，后专机运回拉萨，存在西藏图书馆。后来的纳塘版、卓尼版都据此抄刻。

藏文《大藏经》的第一个刻本是永乐九年（1411年）在南京刻成的。永乐五年（1407年），明朝将得银协巴请到南京，举行一个大法会，然后就请他主持藏文《大藏经》的修刻，该刻本为铜版蚀刻、朱印，是永乐皇帝为了超度徐妃而刻的。明王朝曾送一套给大慈法王，法王将其运回色拉寺，并专门修了甘珠尔拉康。万历皇帝时期，为了庆祝他母亲的大寿，刻了第二个刻本，即万历版藏文《大藏经》。第三个刻本是在藏区的中甸，其实是在丽江刻的，请红帽派的却英多吉主持。这个版后来被蒙古王抢到了理塘，这就是理塘版。^①以后还有卓尼版、德格版、纳塘版等很多刻本。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又名“嵩祝寺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据西藏夏鲁寺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了《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年）续刻了《丹珠尔》。早期印本大部为硃刷，也称“赤字版”，是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很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夹扉画均为手工绘制。这部刻经后来流到国外，后由日本大谷大学多田等观主持，在20世纪50年代影印出版了北京版《甘珠尔》《丹珠尔》全藏，

^①理塘版有完整的一套存放于大昭寺，用108个红木箱存放，据说还有一套流到了印度的达兰萨拉。理塘版的《大藏经》文还见于哲蚌寺之中，但不成套。

印成 151 册方册本，并加入宗喀巴、克主杰、根敦主巴师徒三人的著作，即“师徒三人集”，共 166 函，现称“方册本”。但中国出的藏文《大藏经》未收入本土人的著作（仅有 151 册）。我们现在用得比较多的就是多田等观主持印的这个版，目录做得很好，刻印也很精致。

后来还有乌兰巴托版。乌兰巴托有一个很有名的活佛哲布尊丹巴，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后，逐步接受了活佛转世制度。哲布尊丹巴是多罗那他的转世。多罗那他是觉囊派祖师，哲学见解和五世达赖相对立，主张“他空见”，他曾写了《印度佛教史》，记载玄奘法师之后的印度佛教史。他后来离开西藏去蒙古，并在那里圆寂转世，由他传出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体系后来改宗黄教，成为与达赖、班禅、章嘉并称的四大活佛体系之一。

另有拉萨版，系在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印经院印制而成，日本的河口慧海到拉萨学法，曾带回一套，现在日本东洋文库存的拉萨版藏文《大藏经》就是这个版本。

不丹也有刻本，这是近几年才知道的。不丹是藏族国家，说藏语，系藏语南部方言，加上西部的拉达克方言和国内藏区的三种方言，藏语共有五种方言。

其他还有青海拉加寺版等。

最可贵的是，目前设在四川成都郫县的藏文大藏经对勘局，他们依据四种版本进行对勘，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藏文部》，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对佛教文化和传统的尊重。

第五节 藏传佛教社会化的文学艺术表现

藏传佛教还依靠多种民间手段进行社会化的传播。藏族的说唱艺术，是喇嘛一个人背着经版，走到一个村子，张挂唐卡（一般是指挂着的轴画），就开始说唱表演佛经，既说又唱。这是传播佛教的很好的手段，是藏戏的萌芽。为了宣传佛教，后来有了服装、面具、文学内容的剧本，成为独立的艺术，是佛教走向社会的重要工具。

佛教在绘画艺术上作出了贡献。礼拜者需要一个形象，为适应群众的需要，尤其家庭传教，需要可以心作观想的家庭供养形象，于是产生了新的品种唐卡（thang - kha）（thang 表示权力）。有本书叫《西藏绘画史》^①，作者是美国人大卫·杰克逊。他在书中引用大量藏族学者的著作，并对唐卡的起源、布局、色彩、分类作了很好的研究。可以说，佛教向社会推进的时候，唐卡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壁画、塑像、金铜佛、擦擦（一种泥制小印模，上印佛像、佛塔等）等。唐卡成为藏族绘画的艺术，归功于藏族艺术家们精心的创造。在山南和拉萨有两个派别。另外，在青海黄南同仁县五屯画乡，有三个自然村，约两百户人家，祖传绘画艺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皆以绘画为生，供应西藏、尼泊尔、不丹等地。传说当年宗喀巴大师经过这里进入西藏，当地人求他给留一些指示，大师说“你们学经，脑子不够，给你们一支笔，就学画像吧”，后来真的家家绘画。当地人说这是宗喀巴大师留给他们的谋生手段。

此外还有塑像。最近出版了如《藏族雕塑艺术》六卷。雕塑的很多精品在故宫，是各地进贡给皇上的。故宫里的大黑天有各种形象，非常精美。《故宫藏传佛教艺术》一书介绍了故宫收藏的金铜佛像。

擦擦（tsha - tsha），就是用泥做的脱模小佛像。《米拉日巴传》记载米拉的母亲死

^①[德] 大卫·杰克逊著，向红笏、谢继胜、熊文彬译 《西藏绘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2001 年版。